

从“七诫”到“第二十二条军规”：战后黑色幽默中的权力话语批判

陆皓宇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黑色幽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在战后文学研究中广泛用于揭示制度荒谬与语言操控的现象与本质。在其中,语言既可以通过简化模糊权限界限以暴露管理层的虚伪,还可以通过复杂化消解制度逻辑,这二者共同构建了黑色幽默的批判性维度。本文选取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为研究对象,结合批判性话语分析(CDA)与言语行为理论,从语言层面对权力话语的生成机制与批判策略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分析可见,语言不仅是传达工具,更是权力运作的中介,而黑色幽默正是在语言悖论中展现其深层批判力。本文旨在为后冷战语境下文学语言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提供跨文本与跨语言学视角的参考。

[关键词]黑色幽默;权力话语;批判性话语分析;《动物农场》;《第二十二条军规》

[作者简介]陆皓宇(2000—),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DOI] <https://doi.org/10.62662/ysxk0102006>

[中图分类号] I106.4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ysxk2025@163.com

20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动荡不安,战后格局的形成、极权主义的余波以及官僚制度的高度繁衍,共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黑色幽默。作为文学、戏剧和电影中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法,黑色幽默通过荒诞、悖论甚至病态的表达方式,揭示现代社会中个体面对权力、制度下的荒谬处境。黑色幽默通常基于生活经验而应用,它既能引人发笑,又催人泪下,甚至叫人啼笑皆非,反映作者在痛苦和绝望之后的启示。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1945)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81)均诞生于战争阴影之后,通过黑色幽默对极权统治与官僚机器进行了深刻讽刺。其中,《动物农场》借助动物世界对苏联政治生态进行隐喻性揭示,通过“七诫”这一核心律法的不断修改,展现出权力如何通过语言实现对历史的篡改与对集体意识的驯化;而《第二十二条军规》则以逻辑悖论为核心结构,通过“只有疯子才能免飞,但申请免飞即代表清醒”这一语言陷阱,揭示美国军队中制度理性的崩塌与个体理性的压抑。

本文将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和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为理论工具,深入探讨两部作品中的权力话语建构机制及其批判策略,力图揭示黑色幽默如何在文本中完

成对话语霸权的解构,从而映射出战后个体在压抑社会结构中挣扎求存的精神图景。

一、权力话语的生成机制与黑色幽默的语境关联

权力是福柯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福柯社会理论的基石,是福柯构建社会形态的根源、归宿”。福柯(Foucault)认为,“话语即权力”,权力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解释的东西”。权力话语并非天然存在,而往往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不断建构的产物。而黑色幽默作为一种深具颠覆性的叙事策略,正是在这种话语建构的基础上,通过荒谬、悖论与讽刺的表达方式,将话语的控制性与压迫性呈现于文学语言中。本文所探讨的两部作品——《动物农场》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正是权力话语与黑色幽默相互交织的典型代表。它们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共同展现了语言在制度压制与社会迷宫中的深层角色。

(一)战后世界中的权力话语建构

战后世界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急剧变动,语言作为权力斗争的前沿阵地,成为统治阶层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这一特点在战后文学中亦颇有体现。

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以简洁犀利的语言揭示了极权体制下的语言操控机制。农场的“七诫”

原本旨在确立动物社会的基本法则,但随着猪作为统治阶层逐步掌权,这些诫条被逐条篡改,最终演变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种看似合理、实则悖谬的语言调整,是权力话语控制的典型体现。通过语言的渐进式修改,统治者不仅塑造了新的“合法性”,更通过语义模糊与信息操控,实现了对集体记忆和思想的全面统治。这种语言策略类似于奥威尔在《1984》中所提出的“新话”(Newspeak)——通过压缩词汇、混淆概念,使得反抗的思想在语言层面上都无法成形。

《第二十二条军规》则描绘了战后美国官僚体系下语言的逻辑失效与制度荒谬。小说核心的“Catch-22”军规体现了一种自我指涉的悖论结构:飞行员如果想要停止飞行任务,必须提出申请,但根据军规,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而一旦提出申请,就证明他是精神正常,因此申请会被驳回。通过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个象征,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美国社会及其官僚机构的荒诞、疯狂和不可理喻。海勒通过军规对话的不断重复,使得消极言语交际现象不断被突显,将权力话语的“陷阱式”结构表现得淋漓尽致。军官、医生、律师等话语掌控者以权威话语筑起制度迷雾,借助冗长复杂、逻辑闭合的语言体系遮蔽了权力背后的暴力本质。

两部作品虽然写作背景不同,但都反映了语言如何在政治制度的支持下演变为权力工具,展现了权力话语在历史语境下的不同建构路径。

(二) 权力批判中黑色幽默的关键作用

黑色幽默作为一种带有情绪扭曲与叙事反讽的文学表达手段,其本质并非单纯制造笑料,而是在绝望中呈现理性崩溃的批判姿态。它通过荒谬性的强化和语言悖论的制造,将权力话语的自我矛盾与压迫结构暴露于读者眼前,使本该稳定、合法、权威的制度性语言显得滑稽、可笑乃至恐怖。

在《动物农场》中,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使得戒律内涵被不断篡改,而在其中,斯奎拉作为“发言人”的存在尤为关键。斯奎拉是一个巧舌如簧的演说家,也是统治机构的宣传和粉饰工具。他擅长以大量数据、修辞反问、逻辑转换等手段来为统治合理化,制造出信息过载的语言环境。比如当动物们质疑粮食短缺时,斯奎拉会引用“最新数据”来说明现在的产量实际上超过以往,用语言的表面逻辑掩盖事实本身。这种违反格莱斯(Grice)合作原则中“量准则”的策略,使得语言不再是揭示真相的工具,而是用于混淆、掩盖和操控。讽刺的是,动物们面对这样貌似合理的解释选择沉默,而不是反抗,这正体现了黑色幽默所营造的“压抑中的笑”——笑中藏泪,荒谬之中隐含深层的悲剧。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黑色幽默的运用更为极致。作者用经过夸张的带有疯狂荒诞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有组织的混乱”“制度化的疯狂”。小说中的军事法庭、上级指令、医嘱报告等场景充满了语言悖论与现实逻辑的对立。如医生说:“我们不能让你死,但你必须继续飞行任务。”这类悖论性陈述在逻辑上自洽,在情理上却荒谬至极。其荒诞性来源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指令类言语行为”滥用——表面上这些指令建立秩序,实则剥夺了个体的行动可能。海勒巧妙地利用句式嵌套、条件句泛滥等语言结构,营造出“理性压迫”的语言氛围,使个体在看似合乎逻辑的语言系统中陷入不可逃脱的循环。

在黑色幽默的表达之下,语言常以反讽的方式削弱权力话语的神圣性,而其中的语用张力也常常通过违反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来实现。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上级军官口中“人人平等”“合理安排”等说法,在实际情况下显然与事实不符,构成典型的“虚假陈述”。但正是通过这种语言表层的“真”,与情境深层的“假”之间的巨大落差,读者得以感受到制度话语的虚伪性与荒诞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动物农场》中通过话语修改体现的集体意识操控,还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话语悖论构建的制度陷阱,黑色幽默都作为一种批判工具,对权力话语进行了有效的语言反讽与解构。它通过对语言逻辑的挑战和语用规范的颠覆,使权力语言自身变得荒谬可笑,从而激发读者对现实制度的反思与批判。

二、权力话语的语言策略对比分析

权力话语的表达是文学语言中揭示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控制的核心手段。《动物农场》和《第二十二条军规》分别从极权主义与官僚体制的角度切入,展现了话语如何成为制约的工具。本部分将从词汇选择与语义操控、句法结构与逻辑错位、言语行为与语言功能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中权力话语的语言策略。

(一) 词汇选择与语义操控:意识形态的重构

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构成单位,是权力话语构建过程中最直接的操作手段。通过使用特定词汇并对其进行重复与重定义,权力能够塑造人们的认知框架,实现意识形态的内化与灌输。

在《动物农场》中,统治阶层——猪类通过有意识的词汇再编码的方式成功操控动物们的思想。可以说,话语构建了制度和真理,后两者同样反过来帮助确立主体的位置。例如,“七诫”的原文如“不得杀害其他动物”,被悄无声息地改为“不得无故杀害其他动物”;“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演变为“但

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些变化表面上只是词汇增补或修饰,但实际上则体现了对意义的侵蚀与权力的再生产。正如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中所强调的,话语并不只是传递信息,更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体现。这些词汇的细微调整,逐渐让动物们接受了原本难以容忍的不公,说明语义操控是权力得以维持的关键机制。

相比之下,《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语言操控更具讽刺与悖论色彩。小说中频繁出现的“Catch-22”不仅是书名,更成为军方话语系统的象征。这条充满滑稽和矛盾的规定,让受其约束的人陷入深深的绝望,永远无法摆脱。作者以这种语言的悖论结构揭示了制度对语言的掠夺与滥用,用荒谬的术语掩盖体制的不公。海勒巧妙地用“法律用语”“命令术语”“专业术语”等形式化词汇构建语言的威权性,使话语成为官僚机器运行的“润滑剂”。

两者在词汇操控上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动物农场》的语言策略倾向于“柔性渗透”,通过逐步修改定义模糊权力边界;《第二十二条军规》则采取“硬性封闭”,通过自洽但荒谬的语言结构堵死反抗路径。这一对比凸显出语言在不同制度场域中被赋予的不同角色与功能。

(二)句法结构与逻辑错位:从修辞到话语陷阱

在权力话语中,句法结构常被用作语义操控的“隐形工具”。复杂、冗长或嵌套的句式不仅可以提升语言的权威性,也容易造成接受者的识解障碍,从而实现语义控制。如在《动物农场》中,斯奎拉在宣传过程中频繁使用多重修饰与因果复合句,以制造语言的“说服力”。例如,他常用“据科学报告显示”“与以往相比……我们取得了显著进步”等句式,使动物们误以为自己生活改善,而现实恰恰相反。而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嵌套句的使用则更加突出其悖论性与荒谬性。这种结构可被视为典型的“话语陷阱”(discursive trap),它通过句法构造实现对受众思维路径的引导与封闭,剥夺话语抗辩的空间。

由此可见,《动物农场》在句法层面偏向逻辑修饰与信息堆积,而《第二十二条军规》则利用嵌套与悖论实现思维封锁。两者虽手法不同,但共同体现了权力话语在结构层面上的操控性与操纵性,印证了批评话语分析中“语言形式与社会权力不可分割”的观点。

(三)言语行为与语言功能:从命令到服从的语言实践

奥斯汀(Austin)和塞尔(Searle)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不仅用于描述事实,更具有“施事”的功能。在权力话语中,这一功能被放大,语言

成为权力实施的手段和行动的延伸。两部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话语对语言功能的“反功能化”:本应用于沟通、表达和组织的语言,被改造成隐瞒、混淆与规训的工具。

在《动物农场》中,权力话语主要通过“指令类”和“宣告类”言语行为实施统治。例如,拿破仑以“命令动物减少口粮”“颁布新法律”等形式强化自身的权威地位。这些言语行为背后,隐藏着言语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的断裂。如拿破仑在语言中承诺“公平分配”,而事实上却优先满足猪类的需求。这种“言语—行为”不一致,体现出极权话语的欺骗性与表演性。

相比之下,《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语言实践更为复杂,权力话语通过“规训性命令”与“制度性确认”实现对个体的控制。例如,医生告知约塞连:“你不能停飞,因为你很理性。”这一声明表面上是“判断句”,实则起到了“强制服从”的行为效果。此类语言虽然未以直接命令形式出现,却因话语背后的制度权威而具有不可抗拒的执行力,构成了权力话语的隐性暴力。

综上所述,《动物农场》与《第二十二条军规》虽分别植根于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却在权力话语的语言策略上展现出高度相似的控制机制。前者通过词汇微调与修辞包装实现意识形态渗透,后者借助语言悖论与制度语言完成权力压制。两者共同揭示出语言作为制度延伸、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深层结构,进一步印证了批评话语分析所提出的语言—权力—意识形态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从语言逻辑走向权力悖论:黑色幽默的批判维度

社会生活是由变幻莫测的权力关系形成的网络构成的,这种权力关系受到微观政治学而不是物理力量的影响。而黑色幽默作为一种融合了讽刺、荒诞与存在主义焦虑的艺术形式,往往在语言逻辑的悖论中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批判。它的核心不仅在于“幽默”,更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深重现实与荒谬逻辑,尤其当这种幽默成为对制度、权力、暴力话语的抵抗工具时,其批判性与颠覆性更为凸显。《动物农场》和《第二十二条军规》均以黑色幽默为表现形式,将语言策略与权力结构紧密绑定,从而实现了一种超越现实逻辑的荒诞揭露。在这一过程中,黑色幽默并不只是形式上的装饰,而是深植于文本叙述结构和语用策略中的话语批判工具。

(一)悖论逻辑:黑色幽默的核心机制

黑色幽默的语义机制通常依赖于悖论逻辑(paradoxical logic),这一机制的运用使得文本能够

在语言系统内部制造崩塌,从而揭示体制逻辑的荒谬与现实的压抑。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Catch-22”本身就是一个自指悖论(self-referential paradox)的典型范例,这一逻辑中的循环构造不是为了说理,而是为了制造“无法逃脱”的语境陷阱。这种“用语言堵死语言”的方式,正是黑色幽默讽刺的发力点。

与之相对,《动物农场》的悖论性更具“隐喻”性质,它通过动物世界的表演性逻辑建构出一套看似合理却极端扭曲的社会制度。“七诫”的不断修改构建了一种悖论式的历史书写机制,即“过去是可以被现在任意更改的”,而动物们则在这一机制中逐渐失去反思能力。这种语言悖论本质上制造了一种“有意义的无意义”,即语言虽在运转,但其所传达的信息却并非绝对,而是根据需要在不断变化。

(二)批判性语用:黑色幽默中的言语行为反转

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中,黑色幽默常通过“言语行为的反转”来实现其批判维度。在《动物农场》中,斯奎拉经常进行“宣告式”言语行为(declarative acts),例如:“今天的口粮分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种说法在行为上具有权威性,但与实际状况的对立(动物的饥饿与劳动强度的增加)却使其成为一种“讽刺式”的宣告行为。在黑色幽默语境下,这种言语行为的张力唤起读者的警觉,从而逐渐感知权力的运作机制。而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这种言语反转更为彻底。医生、军官、长官等权威角色的语言经常构建“形式上合理、实质上剥夺”的制度逻辑。这类话语行为表面上是“判断”与“解释”,但实则具备“命令”与“否决”功能,其结果是对个体选择权的剥夺。黑色幽默正是利用这种压抑激发认知上的冲击,使得读者在语义解构过程中感受到压抑。

(三)言语操控与认知规训:幽默的暴力性

权力通过语言构建控制秩序的同时,也在操控受众的认知模式。在黑色幽默中,这种认知规训常以“幽默”的形式包装其暴力本质,使读者在“笑中带泪”的体验中完成意识形态的反思。

在《动物农场》中,语言不只是传播工具,而是重构现实的机制。随着“七诫”的不断“修正”,动物们的判断标准被彻底改变,最终甚至在“猪类行走于两腿”的表演中感受到一种“理所当然”的归属感。语言在此成为暴力的一种形式,属于对认知结构的重塑与操纵。这种暴力是“无声的”,却极具破坏力。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语言暴力则以一种冷静的、机械的方式展开。例如,当士兵被要求完成不可能数量的飞行任务时,命令者总是以一种“毫

无感情”的语言表达:“这是命令。”没有情感,没有解释,没有转圜。这种语言风格虽然简洁明了,却因为其极度脱离人性而形成一种幽默中的恐怖。这种“反人性”的理性是黑色幽默的典型特征,也正是其批判的重点,能够使读者在惊讶与不安中激发批判意识。

(四)叙事结构中的“语言崩塌”:话语批判的最终落点

黑色幽默还常通过叙事结构本身制造“语言崩塌”,即让语言逐步丧失意义、逻辑错乱、信息失真,最终呈现一个“意义消解”的世界。

在《动物农场》的后期叙述中,语言失去了其沟通功能,动物之间甚至已经无法理解彼此所说的内容,语言不再是共识建构的工具,而是掌权者自我封闭的象征系统。当“猪与人类的区别已无法分辨”时,文本中也不再需要语言的明说,而是通过视觉隐喻完成对语言彻底崩塌的描绘。在这个意义上,黑色幽默成为对语言的“终极反讽”:语言的最初目的是沟通,但最终却成为分裂、隔离与欺骗的工具。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类似的语言崩塌也体现在小说最后约塞连的“沉默选择”上。他不再与体制对话,而是以拒绝服从、拒绝语言回应的方式退出系统。这种选择表面是“逃避”,实则是对体制语言合法性的根本否定。而这一情节的构建,恰恰是黑色幽默的最高形式:在笑声中归于沉默,在语言的逻辑尽头揭示无奈与无力。

综上,黑色幽默并不是对痛苦现实的逃避或淡化,而是通过悖论语言、荒谬叙事与语用策略的运用,实现对体制性话语暴力的深度揭露。黑色幽默在其中扮演着审问者与抵抗者的双重角色,通过语言逻辑的悖论展示制度荒谬的本质,最终实现语言层面对权力结构的瓦解与解构。

四、结语

黑色幽默作为一种兼具文学表现力与社会批判力的叙事手法,是《动物农场》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揭示权力结构、语言控制与社会悖论的关键手段。本文通过批评话语分析和言语行为理论的视角,深入剖析了两部作品中黑色幽默的运用机制,为跨文化语境下文学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多维度的解读路径。

参考文献:

[1]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赵焕茹,孙雪娥.黑色幽默:荒谬的真实与绝望的喜剧——从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看“黑色幽默”文学的艺

术特征[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3):50-52.

[3] Orwell, G. *Animal Farm* [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4] Heller, J. *Catch - 22* [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69.

[5] 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4,95-96,98-104.

[6]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7] 李剑.从角色塑造的概念隐喻解读《动物农场》中的形象讽喻[J].内蒙古教育,2018(16):89-90.

[8] 常文革,张炳.黑色幽默的典范——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8):112-116.

[9] 孙欣欣.卡住荒诞世界的脖子——从《第二十二条军规》看黑色幽默[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4):48-50.

[10] 尤泽顺.话语与权力:批评话语分析对福柯的继承与发展[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2(4):73-78.

[11] 纪卫宁,辛斌.费尔克劳夫的批评话语分析思想论略[J].外国语文,2009,25(6):21-25.

[12] 付洁.《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黑色幽默和困境隐喻[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4):91-94.

[13] 丁礼明.福柯权力话语的理论渊源与哲学诉求[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5(5):61-68,124.

[14] 牛红英.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5] Seltzer, Leon F. Milo's 'Culpable Innocence': Absurdity as Moral Insanity in *Catch - 22* [J]. *Language & Literature*, 1979, 15(3): 290.

From “The Seven Commandments” to *Catch-22*: A Critique of Power Discourse in Postwar Black Humor

LU Hao-y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Black humor, as a distinctive literary device, has been widely employed in postwar literary studies to reveal the absurdity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the essence of linguistic manipulation. Within this framework, language operates on two levels: through simplification, it blurs the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to expos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in power; through complexity, it dismantles institutional logic from within. Together, these dual mechanisms form the critical dimension of black humor. This paper selects George Orwell's *Animal Farm* and Joseph Heller's *Catch-22* as case studies and, by integrat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with Speech Act Theor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power discourse is generated and resisted.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language is not merely a vehicle for communication, but a medium through which power functions—and that black humor, in its linguistic paradoxes, reveals its profound critical potential. This study aims to offer cross-textual and cross-linguistic insights into the interplay between literary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st - cold war era.”

Key words: black humor; power dis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imal Farm*; *Catch-22*